

峥 嵘 岁 月

—我军部分高级干部军事历史论文和回忆录选集

军事学术杂志社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峥 嵘 岁 月

军事学术杂志社编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海丰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 字238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 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 张才千 (1)
学习朱德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姜思毅 (15)
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宋时轮 (21)
重温刘伯承同志关于交通斗争的论述 刘华清 (32)
一次成功的诱伏战 韦 杰 (42)
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 丁秋生 (46)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苏权 (51)
强夺“锁钥重地”新保安 段苏权 (62)
驰骋在江淮河汉战场上 张才千 (69)
三破邯郸梦 三出陇海线 李 达 (82)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李 达 (96)
再论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李 达 (109)
三打运城 王新亭 (123)
难忘的九年 舒 同 (130)
败中求胜 雄略高风 何以祥 (139)
略论陈毅同志指挥艺术的特色 丁秋生 (151)
鲁南大捷 栗 裕 (159)
峰县突破 丁秋生 (178)
集中兵力 逐次歼敌 何以祥 (183)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三战三捷 高朗亭 (195)
忍耐持重 把握战机 陈仁洪 (199)
豫东之战 栗 裕 (204)
雄师飞渡天险 踏破“伯陵防线” 邓 华 (237)

胸怀全局	高体乾	(250)
顺手牵羊	高体乾	(257)
塔山阻击战的回顾	吴克华	(264)
志愿军怎样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		
优良传统	李志民	(277)
制敌死命 迫敌妥协	郑维山	(290)
两次大穿插 痛歼美伪军	刘海清	(311)

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

张才千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四个战争时期。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国内外优势装备的敌人，有许多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其中我感到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每一次革命战争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略转变。这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贡献，是我军战争经验中最灿烂的瑰宝。本文试图根据个人的一些经历和学习体会，沿着上述四次革命战争这条主线，对这一历史经验作一番粗略的回顾和分析，以期和同志们共同探讨，求得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对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有所裨益。

红军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与游击性作战

红军时期，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与游击性作战。在作战形式上，前期主要是游击战，后期主要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十年红军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但是，这个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我军广大指战员所认识，它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才实现的。当时我所在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战略指导上所走过的曲折道

路，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27年11月18日，湖北黄（安）麻（城）秋收起义后，诞生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前身——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支革命武装，士气高昂，有三百多支枪和比较充足的子弹，并得到数万暴动群众的全力支援。开初，他们未能根据客观实际实行正确的作战指导，在敌人调集一个多师袭击起义中心黄安时，只知据城固守，死打硬拚，结果因敌我力量强弱悬殊，遭到严重失败。起义群众被残酷镇压，突出重围的部队在无法立足的情况下，被迫转移至木兰山地区，并改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其后，这支武装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在黄麻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这时，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接连进行疯狂的“围剿”。我军吸取黄安失利的教训，改变作战指导，在对付敌人新的“围剿”时，依托根据地，避敌锋芒，实行游动作战，结果不仅粉碎了敌人“罗李”（罗霖、李克邦）、“鄂豫”（刘峙组织鄂豫两省反动军队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根据地会剿）和“徐夏”（徐源泉、夏斗寅）等多次“会剿”，使我军站稳了脚，而且促进了部队的发展。1931年11月，成立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到1932年上半年，我军在作战中迅速壮大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余人，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极盛局面。两种作战指导的结局，以鲜明的对比使大家初步认识到主观指导切合客观实际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央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左”倾路线，加之张国焘热衷于推行这条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正确的作战指导没有得到继续贯彻执行。1932年夏，蒋介石集中三十余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以所谓“偏师”说为根据，坚持采取进攻的策略，主张南下进攻，威胁武汉，致使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在第

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曾提出“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在运动中选择敌人的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的正确意见。但在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下，我军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最后在河口一战又遭严重失败，我军主力退出了苦心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界转移。

张国焘错误的主观指导所造成的第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和西进途中部队受到削弱的事实，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他因此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所以，在川陕地区反敌三路“围攻”，进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和粉碎敌六路“围攻”等作战中，第四方面军重新恢复了武装割据和游动作战。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从而又连续获得胜利，使方面军再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第四方面军已发展到四十五个团计八万余人。可是，张国焘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破坏了这一正确的作战指导的继续执行，致使后来第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再次遭到严重挫折，被迫进行了长征。全国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在作战指导上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斗争实践中终于认识到武装割据与游动性作战的战略指导的正确。

为什么说红军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与游动性作战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呢？这是因为，这种指导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确定的，符合当时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时，已作了精辟的论述。回顾当时的战争实际，我认为以下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这一战略指导的正确性，是很重要的。1、红军分散地创建于各地并处于敌反复“围剿”之中。“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

史。”因此，除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外，红军基本的作战活动离不开各自的根据地。2、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虽然是建立全国政权，但却不得不暂时带有很强的地方土地革命性质，红军作战条件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革命的彻底程度；对红军部队来说，根据地提供着生存和作战的基本条件。3、红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虽然十分简陋贫乏，“但依靠取自于敌和就地补给，基本上能够满足作战需要，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对于红军作战的后方保障并不会发生重大的影响。4、红军的敌人虽然掌握着统一的全国政权，但他们的军队很多是由封建割据的军阀部队构成，其内部派系倾轧的矛盾往往随着深入我根据地而不断暴露，易被我各个击破。5、红军的政治条件虽远比敌人优越，但由于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等条件很差，红军的作战行动需要依赖山区的地势之利，因此，往往需要通过机动寻求到最有利的地形之后，才有条件与敌交战。以上这些因素，规定了红军只能在武装割据的情况下，实行高度游动性作战、诱敌深入、伺机歼敌的方针，而不能采取其他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从而导致后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新的政治形势的出现。由此，我军的作战对象由过去的国内敌人变成了国外敌人、民族敌人，过去的国内敌人变成了朋友。面对这种战略形势的新变化，我军的作战指导是继续红军时期那种游动性作战呢，还是应当加以改变呢？毛泽东同志经过对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

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①因此，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②“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③这一英明决策恰到好处地切中了当时的实际。

第一，日军成为全民族的最危险的敌人，要求我军集中全力对付日寇，担负起抗战的重任。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放开手脚深入敌后开辟游击战场。因为游击战可以使我们获得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的，这种游击战，

“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8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65页

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67页

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① 我军深入敌后作战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和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日军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力和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武器装备的优势，加上政治上的反动，形成了作战指导的高度积极性和顽强性。其进攻作战行动快速，反应灵敏，协同周密，意志坚决。当时的敌我情况，已不允许我军实行大规模的诱敌深入作战，只有依靠分散的游击性的小规模奇袭战法，才能有效地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刘伯承同志就在我们第129师大力提倡以袭击、伏击、急袭三种战法为主，高度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1937年10月，第129师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继之又取得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等一连串著名歼灭战的胜利。实践使广大干部战士深刻体会到这次战略转变无比正确。

第三，日军沿主要交通干线快速推进，占地广大而兵力不敷分配，使敌后出现了大片的空隙地带，给我军提供了创建敌后根据地，壮大发展自己，乘隙进攻敌人的良好条件。在国内战争中，红军往往只能在山地立足；而对日作战，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因此，我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我人民战争优势的广大战场。这是弱军战胜强军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四，日军远离国土作战，其后方交通运输线是其支持战争的命脉。日军头目在侵华开始时就叫嚷“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敌人为了保障快速调集兵力和源源接济补给，在其后方建立起了以铁路、公路为主要运输线，以据点为兵站的运输补给网。因此，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518页

破坏其交通运输线，就能造成对日军的很大威胁，陷敌于严重的困境。这是抗日战争中争夺战略主动权的一种特有斗争。当时我军不拘泥于军事原则上的成规，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了以破袭敌后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后勤，并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

抗日战争的这次战略转变，是由过去的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就增加了这次转变的艰巨性和困难性。然而，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由于广大干部接受和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导，这次转变从总体上讲比较顺利。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我军这次战略转变的成功经验，具有特殊的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实行大踏步进退的作战

我军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战略指导，就其战争实践的总体来看，大部分是规模较小、作战目的有限的非正规作战。把它拿到解放战争中去已不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又一次实事求是地引导我军进行了战略转变。这就是将过去由游击军所进行的非正规战，变为由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大踏步进退的作战。

为什么要实行上述战略转变呢？根据我个人学习的体会，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客观实际情况。1、敌我力量对比的差距缩小了。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军已拥有一百二十万正

规军，二百万民兵，与1946年夏向我全面进攻的一百六十万国民党正规军相比，尽管武器装备上仍存在着显著差距，但在兵力数量上已接近旗鼓相当的程度，完全改变了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兵力相差悬殊的状况。这一情况，使我军一开始就有了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能力。特别是随着我军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的改善和增加，机动能力的日益提高，战略范围内的机动作战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2、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解放战争以前，我军较大规模的机动作战一般依赖根据地内成熟的群众政治条件。到了解放战争，我军政治影响遍及全国和深入人心，与此相反，“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①这一形势，使我军实施大踏步进退的作战有了较好的群众条件。3、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已经对我军提出了大量歼灭敌重兵集团，进而彻底消灭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客观要求，而适应这一要求最正确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4、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我军必须把大规模的作战推向蒋管区，这不仅能有效地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和歼灭敌人，而且也有利于减少我根据地的损失，保护我后方的经济建设。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我军这次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它对加速我军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我军的这次战略转变，在我军历次战略转变中是较顺利的。这主要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而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指导的信赖和对战略方针的熟悉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想起我当时所在部队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印象还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1181页

是很深的。例如，1947年2月，正当我军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时刻，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鄂西北军区党委决定由我军区主力部队组成“中原独立旅”，南渡长江，进入敌后，在湘鄂西和川黔边地区进行机动作战，与蒋军周旋。我们这支部队虽深处敌后，困难重重，但由于大家对大踏步进退、以高度灵活的外线作战打击敌人的方针十分明确，因此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很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新战法，打了一些歼灭战，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这说明正确的战略方针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以运动战为主， 后转入阵地战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使我军踏上了诸军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的阶梯，第一次运用多种技术兵器直接同高度现代化的美军作战。这次战争是在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作战对象和作战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与我军历次战争情况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一，装备上敌优我劣，兵员数量上我优敌劣。美国依赖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在侵朝战争中投入了一千六百余架作战飞机、二百余艘舰艇，大量坦克、火炮和先进技术装备。美军不仅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火力和机动力也大大超过我军。当时美军一个步兵师即拥有坦克一百四十九辆、60毫米口径以上的各种火炮九百六十五门、飞机十九架，各种车辆近四千台。我一个步兵师60毫米口径以上的各种火炮不及敌人一个师的三分之一，部队机动靠徒步。但是，我兵员雄厚，陆军兵力多，在兵员数量上处于优势。其二，战争消耗巨大，我后方补给力远不如敌。美军在

侵朝战争第一年中即消耗作战物资达一千七百万吨，相当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年消耗量的二点六倍。但由于敌人有强大的海空运输力量和日本军事工业的补助，能得到较好的后方补给。我军由于装备的加强，作战物资的消耗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依靠战场上的缴获和就地补给已不能满足需要，而主要依赖于后方的供应。战争开始时因我后方运输力不足，我作战行动受到一定限制。其三，战场地幅狭小，地形复杂。三八线正面不到三百公里，其以北地区纵深仅四百余公里，而且山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样的战场条件，对大兵团进攻作战的深远机动造成巨大困难，但却为阵地防御作战提供了天然的良好依托。其四，敌我双方都是诸军兵种组成的合成军队，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直接关系作战的成败。上述这些特点，使抗美援朝战争出现了特有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特点实行战略指导和战略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开始时对敌人情况不很熟悉，因而我军的这次战略转变，经历了一个反复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才逐步实现和完成。我军出国之前，曾预定采取先防御后进攻的战略指导方针，但后来，根据“美伪军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的客观实际情况，果断地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指导，将第一阶段的方针由原来的以防御作战为主改变为“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随即连续发起了第一、二、三次运动进攻战役。对运动战的指导开始时也还是采用解放战争时期实施战役大包围迂回的打法，但由于我军装备差、火力弱，张口过大，很难达成歼灭战。我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转而采取战役小包围迂回并与战术穿插分割相结合的打法，每战不求围敌过多，但求全歼。这样，我军的主观指导逐步与客观实际相吻合起来。我军通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初步扭转

了朝鲜战局。但随着战争的持久，敌我力量趋向相对均衡，经过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敌我在三八线附近形成拉锯式的对峙状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后，及时预见到战争将拖入持久，不可能短期内解决，于是适时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引导我军及时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依托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以顽强的防御并结合反击，消灭敌人，从而在我军历史上创造了运用阵地战形式，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范例。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不仅使我军在战略指导上有新的发展，而且使我军以往的许多具体作战原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如：在我军的火力支援、对空掩护、机动能力、后方补给等大大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大踏步进退的大规模运动战的作用比以往降低了。集中兵力不仅在进攻作战中更重要，形成优势的倍数需增加，而且在防御作战中通常也需要保持有一定兵力兵器优势。我军有的防御战役曾达到步兵一点五至二倍、炮兵二至三倍于敌的优势。实行歼灭战已经不只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是既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要夺取和保守地方。近战不仅体现为步兵的近距离拼搏，而且在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和海军等诸军兵种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几 点 启 示

通过对我国历次革命战争中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略转变的粗略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军队的优势和劣势地位，并不直接地决定战争的结局。战争虽然是力量的竞赛，胜负主要决定于政治、军事、经济、自然诸条件，但也取决于主观指导，特别是战略指导的能力。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战略指导往往起着决定的作

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居于劣势地位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战略指导失误。正确的战略指导，产生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吻合。因此，我们研究未来战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入手，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探寻正确的战略指导，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具体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整套合乎未来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切记不要拘泥于过去的经验和某些现成的结论。

二、战略战术的先进与落后，并不取决于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与敌人相比，在武器装备上居于劣势地位，但我们在战略指导上却高敌一筹。这一铁的事实说明，军队武器装备的先进与落后，并不等于战略战术的先进与落后。我们的基本经验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先进武器有先进武器的打法，落后武器有落后武器的打法，凡是符合当时当地客观条件，能够指导作战胜利的战略战术就是先进的，或者说是高明的；反之，就是落后的，或者说是不高明的。因此，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既可能产生先进的战略战术，也可能产生落后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比较落后的军队，同样也可以产生先进和落后两种相反的战略战术。这里的关键，在于战略指导者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对头，也就是能否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三、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是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一条基本经验。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将是一场持久战。因为我们和主要的作战对象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拥有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雄厚战争潜力，不经过长期的较量是不能最后决定胜负的。有人认为，现代战争由于交战双方投入大量的兵力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战争的消耗和破坏性增大，战争的持续时间会大大缩短。这个结论是缺乏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

时间短。越南战争、阿以战争、两伊战争、越军侵柬战争和苏军侵阿战争也都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那种期望在未来战争中短时间内决定胜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四、战略指导的积极与消极，并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作战样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以进攻性的行动为主，才算是积极的战略指导。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因为防御作战也可以体现积极的战略指导。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以后，我军在实行全线阵地坚守防御作战中，主动积极地采取各种手段，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这样的防御作战就是在积极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就作战的基本样式而论，一般说来，进攻是积极的，防御是消极的。但是，衡量防御作战是否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必须根据它在当时战略全局中所起的作用作具体的分析。对于全局来说，只要是有利于防者转变劣势地位和争取战略主动，即使是在战略上防御，在战役战斗上也以防御作战为主，也仍然不失为积极的战略指导；反之，如果不利于这种转变，哪怕战役战斗上不停地进攻，也将成为消极的错误的指导。中央军委为我军未来反侵略战争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着眼于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主动，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实现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从战略全局上来认识和理解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以便更好地贯彻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

五、我军战略指导经验最主要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这种战略指导所体现的主观与客观一致，能够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方针，在具体内容上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思想方法上却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学习和研究我军战略指导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应当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怎样运用唯物